

# 数字劳动、数字权力与数字权利：赛博无产阶级的生命政治学

◇ 郝志昌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数字技术的指数性发展及数字平台普遍性体系的形成,数字资本主义早已从所谓的转变期到达了勃兴期、垄断期,开始承载着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结构。脸书、谷歌、亚马逊、推特、微软等成为了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耀眼的景观,它们创造并主宰了新的劳动形态与剥削模式,也同时创造并主宰了新的生产秩序与权力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的勃兴与全面来临,意味着数字本身并不是纯粹的技术事件,而是复杂的社会事件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曾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如何在数字时代表征自身?这是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十字路口”。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性的劳动、权力与权利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之意,更构成了生命政治学最基本的核心体系,它们都将主体的困境与解放的必然性要求视为自己的理论目标。

## 一、数字劳动的生成与赛博无产阶级的出场

数字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的勃兴,这种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所聚焦的生产性劳动,它也仍然在创造着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本,而我们同样也是生产性的数字劳动者。但是,在表面上我们似乎只是在进行着一种非生产性、非压抑性、无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剥削的劳动,因而它的真正本质并未得到普遍性的承认。

数字劳动在今天的生成,实乃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找到了新的地基。虽然用户是数字劳动最典型的主体,但福克斯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数字劳动不仅仅指谓用户的非物质性数字内容的生产,同

时还将一个数字生态系统,即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开采、数字设备的组装、数字软件的研发囊括进来了。在这个基础上,用户与这些传统的劳动者(开采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工人、组装数字设备的流水线工人、设计软件的“码农”等)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交融在一起的劳动群体。

所以,用户在数字平台上所进行的点击式劳动,并不完全以非物质的虚拟方式独立地存在,它是实体性物质劳动的充分联网化和数字化的结果。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区分,并不能给予数字劳动一个有力的解释,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才是确证数字劳动合理形态的关键。即便数字劳动以娱乐、休闲、玩、社交的形式表征自身,它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界定的生产性劳动,但一个重要变化是,它的非物质性的成分、新的剥削方式在今天却大大超出了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想象。这不是马克思生产性劳动在今天的直接延续,而是数字化的更新与生成。

当生产性劳动逾越过工厂的围墙,蔓延到整个社会,当沙发成为新的生产车间时,无产阶级的新形态——赛博无产阶级也应运而生了。赛博无产阶级是维斯福特和胡斯两位数字劳动的研究者分别在《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与《赛博无产阶级的形成》中所提出的术语,他们将数字控制论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意指凡是从事数字劳动的无产阶级都铭刻着赛博的印记。在今天,“强制移动连接就是控制论的无产阶级化所必须的日常行为”。然而,赛博无产阶级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概念,两位作者并未做出说明。

如果经典的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等同于工厂中的工人阶级,那么赛博无产阶级在今天就等同于数字平台上的大量用户,以及处于这一数字劳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生产劳动工人。换言之,赛博无产阶级不仅指谓平台用户,同时还包括一个系统性的生态链中的传统劳动者——比如开采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工人、组装数字设备的流水线工人、研发数字软件的“码农”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后者实际上同时也具备用户的身份,用户构成了赛博无产阶级最具典范性、表征性、普遍性的概念。因为对于用户而言,一方面,他们同样地不拥有独立的生产资料,数字平台于他们而言只具备使用权或访问权,这种权利只不过是生产权而已,他们只要使用或访问数字平台,就会生产出他们的对立面——资本。所有权是掌握在平台资本家手中的。另一方面,他们同样从事雇佣劳动并获取一定的工资。表面上看这一判断不合常理,因为用户并非与数字平台之间有过任何雇佣协议,并且用户也从未获得过工资。但鲁斯一语中的:“资本家不向用户支付使用其服务的费用,这似乎类似于工业资本家可以不向工人支付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正在进行的交易。正如工人不工作就得不到工资一样,用户在不放弃对其数据的重要权利的情况下也无法访问他们需要的服务和平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缺乏平台的数字参与就像缺乏基本的物质需求一样。并且,为了在当代世界获得生存,某些数字互动是必要的。如果我们需要生存,我们就需要这些数字互动。质言之,当整个社会都成为工厂,雇佣劳动也已经完全泛化、彻底化,工资也以“免费服务”的方式交付给用户。这是一种非传统雇佣劳动的雇佣劳动与非传统工资的工资,是雇佣劳动和工资的高阶形态,而绝非它们的否定形态。由数字劳动所催生的赛博无产阶级已然出现,但这只是一个自在的现实,它的自为性仍需要进一步的筹划。

## 二、数字权力的管控与生命政治的新精神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仅仅确证数字劳动及其所塑形的赛博无产阶级的合理形态,还远远不够。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如何保障数

字劳动的持续性,或者如何保障赛博无产阶级能够持续性地提供他们的劳动力,这是数字资本主义不断获取剩余价值并稳固自身的关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是资本主义的服从问题,服从问题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权力管控的最重要表征。因为权力是“能够让一个社会行动者以有利于掌权者的意愿、旨趣以及价值观的不对称方式影响其他社会行动者(们)的关系性能力”,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非对称性的能力,确立起服从性的关系。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劳动作为资本的实际从属地位,意味着权力的管控已经开始发挥它的功效。数字劳动与赛博无产阶级在创造剩余价值,并被剥削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数字权力的管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件”。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福柯的两种权力技术的铰接与生命政治的样态,都依托数字平台发生了极大改变,即数字权力的管控与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这使得赛博无产阶级更为容易地成为资本统治下的被驯服的“有用的力量”。

一方面,数字平台主宰了我们的交往手段:“我们有一定种类的社会互动:分享新闻和八卦;交朋友;与家人保持联系;买卖;组织并受邀参加社交活动;分享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了解他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如今不使用脸书、谷歌或微软平台,就很难满足这些需求。”我们要获取一定的交往,就必须积极地、有创造性地参与到数字平台中去。数字平台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交往手段这么简单,它在本质上是生产手段。赛博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真实需求,必须进驻其中,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到数字权力的管控。

另一方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注意力”成为继死亡率、出生率、再生产比率、受教育率、人口密度率之后的人口新的要素与数值。数字权力在今天必须从“注意力”方面重新统计人口、组织人口,生命政治的治理才能得以继续存在。赛博无产阶级的注意力是在诱惑力中被制造出来的,它的服从性与有用性也是在诱惑力中被有意塑造出来的。

数字权力的管控俨然大大超越了以往时代的权力形态,它使赛博无产阶级表现出了新的服从,生命政治的治理在此时也获得了新的精神。这种新的精神体现为:赛博无产阶级“显然”是自愿地、积极地、创造性地并乐在其中地进行数字劳动,数字平台“显然”也以经济民主的面相彰显自身。然而,这种自愿与民主恰恰是数字权力炮制出来的幻景,“玩儿”劳动就是这种幻景的最佳解释,它在欢声笑语中轻松地褫夺走了一切。正如布莱恩·布朗所呼吁的那样:“社交媒体及其附带的规范和习俗让生命政治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更加巧妙地塑造了主观性。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错过了对这些权力关系以及它们被当代环境改变的方式更彻底的理解。”

### 三、数字权利的筹划与数字共产主义之势

数字权力的管控与生命政治的新精神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以一种新型的权力形式让赛博无产阶级的生命在“集体无意识”中受到驯服,赛博无产阶级真正的未来及其生命的价值是被其有意忽略乃至遮蔽的问题。即便赛博无产阶级在数字权力的管控中获得了所谓的数字权利,但作为被驯服的生命,这种数字权利仅仅是虚假的、有意被塑造出来的假象,它既不能真正内在于生命本身,也不能正确证生命的本质。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就是对数字权利真正的筹划,以及在虚拟赛博空间中开显出数字共产主义之势,这成为进一步审视赛博无产阶级生命政治学的关键。与此同时,这也是赛博无产阶级从经验层面的自在性走向建构层面的自为性的关键。

对于我们迫切期待的人类未来而言,赛博无产阶级要想成为自为的反抗主体去争取应然的权利,并引领数字共产主义之势,就必须诉诸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数字资本运动的逻辑架构”。这是赛博无产阶级生命政治学的应有之义,更是决定生命政治学能否现实地、彻底地回应权力的管控,从而真正实现自己允诺给生命的权利。数字权利的筹划与数字共产主义之势的展开,必须要求生命政治学在原则性的尺度上对私有制与私有财产所表征的对立关系进行扬弃。

因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私有制与私有财产的排斥关系不仅仍然存在,且得到了更加高阶的演绎。其绝非是平台所有者所描绘出的公益的、免费的社交手段那么简单,而是在新的赛博时空中生产与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其将数字资本与财富迅速地集中到数字平台的所有者手中,垄断了普遍智能的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保障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权利的法律,也被私有地、有意地规定。“数字平台的“自我宪法化”意味着它将原本保障权利的法律“私有”了,法律因此也具备了随时可被修改的任意性,这显然能够时刻制造出数字平台中生命政治的“例外状态”,而赛博无产阶级的权利随时会被平台悬置。

由此,赛博无产阶级对数字权利的筹划及引领一种作为“数字运动”的共产主义,就必须提出数字平台的领导权问题,才有可能开显出超越私有资本逻辑的共享文明。数字平台作为一个更加商业化和更加商品化的系统,同时也意味着它是更加资本主义的系统,它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及对权利的褫夺也将更加容易。只有数字平台的私有制与私有财产的排斥性权力关系被彻底扬弃,权利才能复归到生命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系统的数字平台才能被扭转为公有性的共产主义系统。至此,生命政治学对权力的回应才算彻底完成。这同时也成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十字路口”,数字平台要超越资本的文明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打破私有逻辑的束缚,构建公有逻辑的共享文明。

数字平台是这一时代的新生力量,但它处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赛博无产阶级是数字时代新生的工人,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赛博无产阶级能否成为数字时代的“阿尔戈英雄”并成功地获取“金羊毛”,不仅关乎着其真正的未来,更关乎着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作者简介:郝志昌,河南孟州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摘自:《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